

网络民主在中国的功能及限度

郭小安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3)

摘要: 在中国现实背景下, 网络提供了新的民主方式, 激活了民主的元素, 重新释放了受到压抑的民主参与热情, 重塑了民主形式。网络民主发挥了政治输入和反馈、政治监督和纠错、政治宣泄和矛盾缓冲等功能。但网络民主功能发挥受现实政治的对接和容纳程度的影响; 网络的“群体极化”和“协同过滤”带来的信息窄化和情绪的极端化影响及网络的隐蔽性和离散型带来的非理性参与行为的负面效应将影响网络民主功能的发挥; 网络民主参与主体的结构性限制亦影响网络民主的深度和广度。网络民主的功能发挥取决与政府和公民是否能够形成良性互动。

关键词: 网络民主; 现实功能; 影响因素; 限度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5-0631-09

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 都会给政治和社会带来影响。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 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它从技术上突破了传统^①民主形式造成的局限, 为民主政治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网络民主(也有人称为数字民主、虚拟民主、电子民主等)就是由网络技术衍生出的一个新鲜而时髦的话题。当然, 网络民主不是一种独立的民主形态, 它是公民借助网络技术为媒介参与和影响政治生活的新型方式。最早对网络民主概念进行界定的当属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 他在《网络民主——因特网和公共领域》一文中把网络民主界定为“网络民主为公民借助网络技术, 通过网络公共领域加强和巩固民主的过程”^[1](218)], 随后, 美国的 Graeme Browning^[2]出版了《电子民主: 运用因特网改革美国政治》, 劳伦斯·克罗斯曼(L. Crossman)^[3]出版了《电子共和国: 重塑信息时代的民主》, 以及英国的 Roza Tsagarous^[4]出版了《网络民主——技术、城市与城市网络》等, 由此拉开了研究网络民主的序幕。

在中国, 虽然理论界虽然对网络政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而且现实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网络给民主带来的变化: 如网络政治表达、网络政治交流、网络政治宣泄、网络结社、网络政治监督等现象的出现, 但是对网络民主这个新鲜事物的理解还显得模糊, 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地带, 而且从现实角度来看,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范层面、理想层面, 或者是价值层面

的论证和争辩, 即便是涉及到现实层面的仍然停留于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吸收或简单移植, 而对不同政治生态背景下网络民主的差异性鲜有关注。本文无意从规范层面论证网络民主的政治功能, 也不想陷入“网络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循环争论中, 更不想采用“一分为二式”的简单而省力的论证方式,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背景下, 网络民主究竟在哪些层面起作用, 在哪些层面又会受到限制? 在现实的前提下, 网络民主对中国民主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 它的功能又会受限于哪些影响变量? 网络民主的出现将会给中国的民主道路带来何种新的变化?

一、网络民主在中国的缘起

网络民主兴起于 20 世纪末, 此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期, 一方面, 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加快, 基础教育普及率和民众识字率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 社会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 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初步规模, 但面临严重的短缺困境, 面对公众强大的民主压力, 政府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缺乏足够的制度化能力与引导能力, 表现出一定的失衡状态。这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经济先行, 以经济发展带动政治改革”的非均衡发展策略是息息相关

收稿日期: 2008-05-21

作者简介: 郭小安(1980-), 江西遂川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网络政治传播,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的。

取这一策略,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经历了十年的文革动荡,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严重滞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能否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中谋求发展是现代化成功的关键。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5](284)}国外学者也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政治动荡,政治不稳定几乎成了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伴生物。因此,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6](318)}。只有依靠强大的政府能力保持政治稳定,社会资源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和高效利用,社会才可能在政府动员下由分散状态走向集中。

这一策略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发展的后遗症。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滞后的政治改革导致了强大的民主化压力,民众的政治参与面临严重的制度供应短缺。这种制度供应短缺主要表现在:制度化参与渠道狭窄,法制途径成本太高,表达民意机构功能虚化,许多原本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参与权利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落实。制度供应短缺导致了非制度化参与和非理性参与。但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政治参与趋势是无法抑制的,同样,在改革开放中聚集起来的强大民主诉求也不容忽视,如果政治参与问题得不到解决,民主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势必影响政治现代化的持续与稳定。政治现代化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参与能否与政治制度化水平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能否稳定及持续的关键因素。如日本政治学者蒲岛郁夫认为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息息相关,“政治参与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的函数。同时,政治参与为政治稳定发挥作用。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制对国民意愿的反应越敏感,随之,也可以提高公民同政治体制的一体感和正统性,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的稳定”^{[7](41)}。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国家能否解决好参与危机,即能否吸纳和满足新兴利益集团的参与愿望和动机,是能否保持政治秩序关键^{[6](206)},他提出的“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稳定”公式,是研究现代化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关系的经典范式。可见,参与热情高涨与制度化参与渠道狭窄所形成的参与困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障碍。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所承受的民主压力将越来越大。

网络的兴起给中国民主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

展契机。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与渠道,为民众参与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持。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面对网络民主现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正如李永刚所言:互联网的扩张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政治控制的“克星”,它正以自己的节奏改变甚至摧毁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机制^[8]。传统政治控制的失效释放了中国民主的空间,激起了民主极大的参与热情,但同时又处处受到现实政治制约。可以说,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在为网络民主提供发挥空间的同时,也为网络民主的作用设定了一个限度范围。

二、网络民主在中国发挥的现实功能

在探讨中国网络民主的功能之前,我们还是回到与民主相关的话题中,当然这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9](7)},各种民主理论范式粉墨登场、错综复杂,探讨民主问题将注定会引来无穷尽的争议。但另一方面,在各式各样的民主理论范式背后,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民主是一种参与,对参与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民主观。如谁参与、参与什么、以何种手段参与等。从政府过程的角度来看,完整的政府过程包括:初始阶段、过程阶段和结果阶段,民主即意味着公民采用特定方式参与政府过程,那么,民主的范围和层次也可以界定为初始民主的民主、过程层面的民主、结果层面的民主。初始层面如选举民主,过程层面如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咨询民主等,结果层面如监督民主等。

那么,网络民主在政府过程中发挥什么功能,其作用的范围多大?这是由现实政治所决定的。从技术和政治关系来看,网络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它以一种全新的技术塑造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它的作用范围又受到现实状况的制约,它只是现实政治在虚拟空间的一种投射。所以,网络民主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下,其功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美国 AFA 协会在其撰写的《网络民主:2001 年全球范围内的考察》一书中,把网络民主的功能概况为:电子政务、电子投票和电子选举、网络政策参与、网络议程设置等^{[10](1-7)}。美国学者拉维在《网络民主——网络的权利》一文中把网络民主的功能概况为:网络投票、网络选举、网络政治广告以及网络政治参与等^[11]。概况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辅助性治理手段,其在现实政治中运用最多

的是网络的便捷性和互动性,网络给了选举和投票等提供了诸多便利,减少了成本,扩大了政治效能。其作用形式如电子选举、电子投票以及电子参政议政等。如选举中的网络宣传,政治广告、网络募集选举资金和志愿者以及公民在行政、立法、司法过程中与政治家的互动等。

我们在探讨网络民主的作用范围时,绝不能忽视不同政治形态之间的差异性。中国的政治现状决定了网络民主发挥的作用范围还相当有限。如果把网络民主的作用范围分为两个维度——参与和影响,那么中国网络民主更多体现在影响而非参与上,即便是参与,也只能体现在过程和结果的某些层面的参与,如电子政务、政府信息的公开,官方与网民不定期的互动,以及不定期的收集调查民意等。总的说来,网络民主对中国现实政治发挥的作用范围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功能上。

(一) 政治输入和反馈功能

政治系统原理表明,政府过程就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息(公众意见和民意)输入、输出及反馈过程。政治系统的平衡有赖于输入与输出的协调,而这种协调是依靠反馈实现的,通过反馈,政治系统就可以不断进行输入——输出——输入——输出……,从而使自身无限延续下去。如果没有反馈,政府就无法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有效判断,从而直接影响到输入与输出环节的数量与质量。“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信息,任何系统都不能在一个稳定的世界中持续下去,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更不能持续下去,除非有意外。”^{[12](366)}可以说,反馈对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在当今世界上,什么都无法逃脱公众意见的沙轮……这个是一个取悦公众的时代。离开了公众的支持,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能够长期兴旺发达。”^{[13](10)}

在中国,传统的政府过程是一种输入、输出与反馈三者失衡的政治系统,政府输出过于强大,而输入和反馈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狭窄,缺乏表达真实意愿的机会,通常作为民意输入、输出管道的大众传媒,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被政府牢牢控制,导致功能缺位;公民的政治认知过程也是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公民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对信息的获取和辨别能力非常有限。可以说,传统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建立在对信息的控制和专享上,信息是权力的象征和源泉,层级越高,所拥有的信息量越大。国家通过控制信息,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公众的政治认知和判断,塑造他们的政治情感体验方式。例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防

止危害政治系统安全的信息散布,对政治舆论和进行引导和控制等。在国家主导大众传媒的情况下,普通公众获得的都是已被筛选的政治信息,那些企图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组织和个人,想宣传自己的思想,往往由于自身势单力薄和成本过高而最终放弃。这样,国家就能够轻易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内容(或声音)塑造统一的政治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14]。客观来说,信息输出的专一化对于党和政府推行政策法规,维护政治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了种种弊端,如导致政治传播渠道失真、公民社会发育滞后、公民自主精神凸现不足、社会活力被严重压抑等。由于传统的传播媒介受到各种人为控制和技术限制,无法有效反映真实民意,从而进入政府决策过程,加上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导致政府权力缺乏外在约束力量,极大地妨碍了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正如有学者所担心的:“在相对与互联网而言的旧媒体中,我们不少媒体的宣传模式是僵化的,许多报道内外有别,话语生硬,内容空泛,形式陈旧,言路闭塞,甚而至于借用民意,引导与制造舆论之心太过直露,劣势早显。面对互联网,如果继续这种僵化,中国的传统主流声音将可能最终在全球化的传播系统中失语。”^{[15](134)}

网络提高了政治表达的自由,开创了信息多元化和言论自由的新局面。网络在改变以往封闭的政治生活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参政工具,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平等地享有知情权,更加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观点,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的权力、义务和责任。可以说,网络带来的民主参与激情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政治系统输入、输出和反馈的严重失衡状态。

一方面,网络所释放的参与热情聚集了强大的民意,这些民意为政治输入提供了现实素材;另一方面,网络也为政治系统中公民的反馈提供了可能。网络议政已经使公众意见得到了凝聚和彰显,曾经静默且彼此隔阂的公众声音,开始在网络空间中汇集和展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制度渠道,向政治决策层及时导入这些网络民意,但这种不同以往的意见汇聚和表达方式,正在强化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传递对于封闭政治的焦虑,使得现实政治被迫做出回应,这无疑是民主的进步。如“孙志刚事件”,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有赖于网络舆论,“刘涌案”、“宝马案”的重审也与网络舆论的压力有关,“厦门PX项目”基于政府与网民的互动。尤其在2008年两会期间,网络和政府的互动更形象体现了网络民主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的强大

功能,网民对政府提出了多达几十万条意见和建议。温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公开肯定了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沟通方式,并在开场白中说:“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16]根据2007年北京锐智阳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调查数据调查显示:35.4%的受访者认为我们国家的政务活动,尤其是两会,越来越重视通过网络征集民意;而认为这种政府征集民意的作用很大的比例高达28.7%。^②其中对“你参加过政府征集民意的活动?是否认为政府越来越重视网络民意?”的问答结果见图1;对“你觉得政府征集民意的作用大吗?”的回答结果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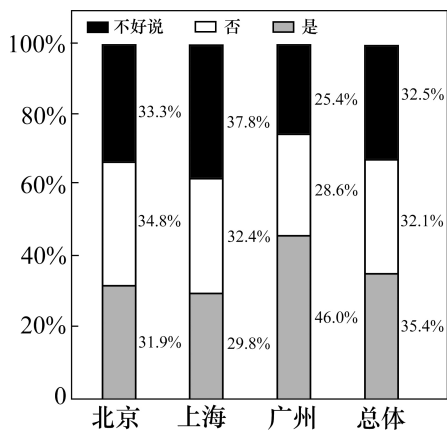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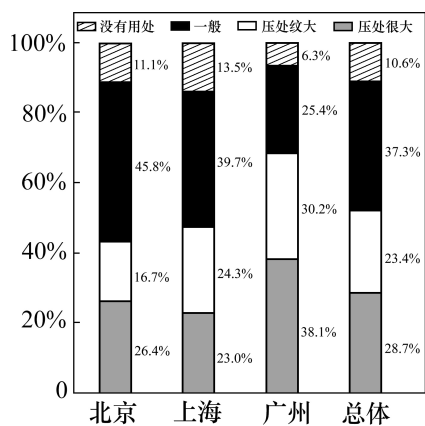


图2

可以看出,互联网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充分证明了我国高层对网络舆论的重视,也意味着政府高层在学会利用互联网促进民主,下情上达,与民意形成良性互动,对现实的民主起到了促进作用,“因特网像一张‘不放过任何东西’的庞大的蛛网,它所具有的对信息的搜集、存储、传递和处理能力,对打破政治生活领域内的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

集权控制,潜在地具有颠覆作用;它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天然地符合民主精神”^[17]。

(二) 政治监督和纠错功能

政治监督和纠错机制通常作为衡量一国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甚至民主发展程度的核心标准。一般来说,政治监督可以分为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体制内监督主要依靠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体制外监督主要依靠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和市民社会来实现。在我国,由于体制内缺乏监督和纠错的制度安排,政府作为政治沟通和传播的主导力量,无法对自身形成有效监督;体制外监督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也先天不足,“中国的新闻传播在对权力实施舆论监督,特别是批评报道方面处于天然的劣势,从而产生‘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问题”^[18](37-46)]。监督力量与纠错机制的缺失已成为影响我国民主进程的强大阻碍。

网络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监督机制纠错机制,它加速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和成长,营造了一个体制外的民主力量,这种独立的力量无疑对政府起着一定的监督和纠错功能。尤其是在主流媒体的普遍失语状态下,这种力量更是难能可贵,从孙志刚事件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到“宝马撞人”案审判结果的改判,以及厦门PX项目地址的改迁,乃至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华南虎打假事件”,这种因为网络舆论监督而改变政府决策的实例举不胜举,一时间,原本被隐藏起来的民意终于被网络激活,政府无形中多了一双监控和监督的眼睛,政府在面对强大的民意面前不得不调整甚至改变决策,“这种正如屈服于公众意见而改变议事日程,在过去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但现在却确实确实地出现了”^[19](141)]。网络的监督和纠错功能表现在:首先,网络聚集的强大而真实的民意弥补了传统时代“虚假民意”和“民意不足”的弊端。在传统时代,由于身份的公开性让人很难表达真实想法,往往随大流,甚至说假话。网络政治参与将改变这一现状,因为网络的匿名特征使得政治参与更加安全,更加自由。在网络参与过程中,参与主体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因而可以迅速、集中、真实地反映公众的意见和要求。

其次,网络也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搭建了一个有效平台。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于1962年提出的,哈氏提出的“公共领域”并不单纯指公共自由表达的场所,在哈氏那里,“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其相对独立性和批判性,按照哈氏的原意:“理想的公共领域绝非单一、普同的公共概念,而是能够开放给弱势者表达不同意见,容纳多样的意见表达,丰富公共论坛的多元性。在此公共领域意含传媒应提供开放的公共论坛,尊重弱势社群的发言空间,呈现

多元化的报道,以彰显公共领域的精义及多元社会的理念。^{»[20](173)}哈氏指出,西方社会目前的公共领域正处于萎缩状态,它将受到政府权力扩张和资本权力扩张的威胁,其公共性和相对独立性在逐渐丧失,哈氏呼吁重建公共领域,促进公共领域的结构转移,其关键是建立一个“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网络的诞生为营造一个理想公共领域提供了便利,由于网络的平等性、离散性、便捷性特点,使得网络很容易削减传统的精英话语垄断和控制状态,也可以使人们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话语和思想,一定规模思想碰撞后形成的交集就形成了网络舆论,与传统舆论相比,网络舆论显然更具有独立性、能动性和批判性,可见,网络的出现使得“非强制的交往空间”的得到了彰显和实现;此外,网络也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打破了传统时代个人空间的隐蔽性与公共空间开放性的困境,加速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在传统时代,人们的生活始终处于一种矛盾对立状况,一方面,人们渴望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保持一定的个人隐私和自我边界;另一方面,又渴望与他人交往,处于一种集体狂欢之中,这种矛盾的对立状况不利于公共空间的形成,也不利于交往理性的发展。网络的出现重新界定了传统的政治活动,创造了新的对话式民主机制,不仅消除原有空间上的限制,而且使得国家作为原有信息控制的角色逐渐消融。网络空间的重要影响在于“把自我排他的私人空间扩展到联机共享的精神空间,同时为隐私保留目前的社会空间”^{»[21](264)}。在网络公共空间里,人们可以很好地解决个人空间的隐蔽性与公共领域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可以关起门来,舒适地呆在自己熟悉的场所里,在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秘密的前提下,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互动;另一方面,人们却好像进入了一个公共场所,能够同时和许多人聊天或是对他人发表自己的意见。网络空间以一种颇为特殊的方式,将传统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结合了起来。在这一特殊的社会空间中,人们可以隐匿自己在真实世界的部分或全部身份,并自由地决定自己要呈现给他人的面貌。”^{»[22](205)}网络空间很好地消除了个人与公共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公共空间的发育与成长。

总之,在网络时代,网络可以加速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也有利于公共领域的成长,而且网络舆论和网络公共空间具有真实性、离散性、独立性和能动性等特点,可以成为监督政府的体制外力量,也可以发挥一定的政治纠错的功能。“网络中出现的新形态的舆论空间,毫无疑问为社会重新整合舆论力量,帮助政

府在决策中提高透明度有着积极意义。网络公共空间维持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张力,保持这种张力非常重要。因为它能监督政府的运作,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19](143)}

(三) 政治宣泄和矛盾缓冲功能

除了发挥上述功能外,网络民主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就是充当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的调节器、缓冲阀。

在传统时代,由于社会结构分化不大,整个社会高度整体划一,社会调节器的必要性不是那么强烈。但在今天,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难免会产生心理压力与挫折感,特别是这种挫折感和压抑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释放出来的时候,需要一定的宣泄渠道去缓解,否则将对政治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传统时期,这种挫折感的宣泄主要通过人际之间的传播完成,这不管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均远远不够。

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宣泄渠道,在现实中承担起社会情绪、社会心理的缓冲阀、调节器的作用。政治现代化理论表明,公民如果遇到了政治问题,会产生焦虑感和挫折感,进而诉诸政治参与,如果现实的制度化渠道无法满足,他将可能采用非制度化参与甚至极端情形来解决,以致最终危及政治稳定。网络很好地解决了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狭窄的矛盾,它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政治交流、政治宣泄的渠道,可以从内心缓解由于现实政治挫折带来的焦虑与紧张感。虽然匿名表态是一种躲避,没有真正获取话语权,尤其是政治话语权,但蒙面式的互动使每一个传播者都是大众,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解构着精英话语,给了大众以互相的思想暗示与牢骚刺激,达到了“发泄筒”的作用。虽然过多的政治宣泄(政治牢骚)对政治系统会产生破坏性,但适度的政治宣泄却是必要的,它可以缓解社会成员的内心愤怒,疏导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它往往可以把社会成员的不满和不安诉诸口头,否则,如果内心的愤怒未得到及时排解,久而久之就很可能采取更激进的非理性行为,就如鲁迅先生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另外,网络宣泄如果能得到政府的有效引导和调控,将能成为矛盾的缓冲带。民众在良好地利用网络缓解现实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带来的紧张感和焦虑感时,可以产生比制度化参与更理想的结果。如果政府能和网民良性互动的話,可以借助网络的优势对现实矛盾进行舒缓消解,而公民也能在网络协商、网络交流、甚至网络宣泄当中缓解政治矛盾。若政府听之任

之,现实政治参与的不满足感和挫折感越严重,人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虚拟与现实的分裂^{②[23](71)}。网络宣泄和矛盾缓冲功能其运行机制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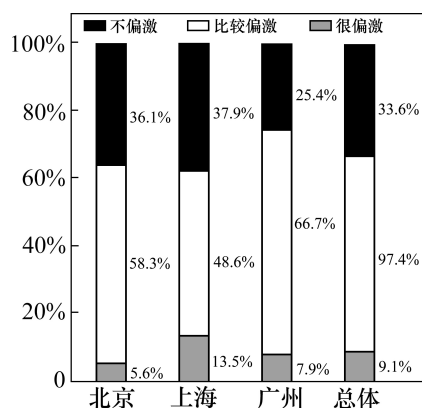


图3 网络宣泄和矛盾缓冲功能运行机制示意图

三、影响和限制网络民主功能发挥的变量因素

网络民主要发挥其功效,还受限于种种因素,网络本身也可能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如果我们过分夸大网络民主的作用和功能,最终带来的只是民主的幻像和乌托邦。

(一) 现实政治的对接和容纳程度将决定网络民主的功效

由上可知,网络只是给民主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技术手段和参与渠道,但它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民主形态,换句话说,网络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技术,但也仅仅是技术,它替代不了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决定不了现实政治的内容,更不能决定现实政治的发展,而是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影响政治生活。它只能去改变民主的技术手段,影响民主发展的进程。网络技术的政治影响不应从技术本身寻找,而应该从由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变迁中寻找,正如卡斯特尔所说的那样:“强调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影响,是因为这些戏剧性的技术变迁,是当前最直接感觉到的结构性变化。但是这并非认为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②[24](15)}尼葛洛庞帝也指出:“网络真正的价值正越来越与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信息高速公路不只代表了使用国会图书馆中每本藏书的捷径,而且正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②[25](214)}可见,

网络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它以一种全新的技术塑造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它的作用范围又受到现实状况的制约,它只是现实政治在虚拟空间的一种投射。“网络空间与资讯技术,在根本上就和其他技术一样,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揭显与设框,是牵涉人类存在条件的特殊模式。”^{②[26]}可见,网络民主的功效需要和现实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要有现实的政治参与制度衔接,网上政治才能从虚拟空间接地,成为现实政治的补充途径。如果网络民主持得不到有效调控和引导,最终导致的结果只是解构而非建构,争论而不是共识,这对中国的民主建设是非常不利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提到的那样:“互联网其实是一个良莠不齐的复杂世界。固然有神奇和伟大的一面,但也有很多局限。姑且不论网络舆论的碎片化,泡沫化,快餐化,情绪化。其最大局限,在于不能让政府走出孤独。网络议政无论如何繁荣,毕竟限于虚拟世界,不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制度化的力量。这就注定了以网络为平台的公众参与,仍然只是原子式的个体的参与,仍然只是一盘散沙的参与,仍然不存在有组织的力量、制度化的力量与政府对话,去监督政府,制约政府,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孤独境地。”^{②[27]}所以,网络民主如果不以组织化和制度化为前提,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一种无序的广场政治。现实的政治系统必须学会和网络民主相对接,加强和网络民主的互动,并积极把网络民主这一体制外的民主力量纳入到体制框架内,使其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批判力量而不是破坏性的力量,这将对我国民主建设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网络本身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影响网络民主功能的发挥

1. 网络的“群体极化”和“协同过滤”带来的信息窄化和情绪的极端化影响

“群体极化”是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提出的,他用“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理论解释了网络舆论形成的心理机制。所谓的“群体极化”现象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简言之,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群体的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②[28](5)}。而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即网站通过信息的同类收集和网址链接,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容易导致信息的“窄化”,这可能会加速“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可以说,“协同过滤”和“群体极化”现象是网络中出现的普遍现

象,这也使得网络舆论除了具备真实性特点外,还具有偏激性、夸大性、煽动性,以及夹杂大量的宣泄情感成分。根据2007年一次网络调查数据显示,有近六成受访者认为57.4%的人认为网友的意见比较偏激,比较带有情绪性。

2. 网络的隐蔽性和离散型带来的非理性参与行为的影响

网络民主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虚拟性容易带来非理性参与的盛行。在网络中,任何一个支点都可以变为中心,没有一个终极的管理者,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领导和管理者,网上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说话做事,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因而互联网彰显的价值观是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有一个著名的黑客宣言(the Hacker Ethic)宣称:进入电脑的权利应该是不受限制的,一切信息应该是免费的。这个宣言的潜在含义就是一切控制都是错误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网络无政府主义的产生,甚至有人断言,Internet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真正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东西。那么在这样一个政府难以有效控制的电子荒野上,亿万网民的亿万种声音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另外,网络民主的非理性行为更难受到传统政治控制手段控制。互联网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结构。正如乔丹所言:“在因特网上,完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晓你的种族和性别。这种肤色盲和性别盲对很多人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大受欢迎。”^{[29](66)}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中,难以控制的信息传播打开了言论自由的魔盒,而政府面对各种“异端信息”时显得力不从心。正如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所描绘的那样“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25](274)}由于网络技术的特殊离散结构、无中心、无界限,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管理控制,再加上网络时代政治参与主体虚拟化特征,使得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控制异常困难,也会导致大量的非理性参与行为的产生。在网络中,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自由传递政治信息,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每天在网上传播的信息不计其数,面对互联网中海量信息的不断轰炸,相当多的民众缺乏驾驭这些信息风暴的能力,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这些信息,表面上拥有无数信息,实

际上却可能茫然不知所措,致使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可能在人云亦云的盲从中失去理性。正如埃瑟·戴森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30](17)}。

(三) 网络民主参与主体的结构性限制将影响网络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根据CNNIC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报告。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从年龄分布来看,目前中国的网民群体仍以青年为主,总体网民中的31.8%都属于18~24岁的青年。这个年龄段的网民中,学生网民群体占据重要地位。与人口总体相比较,网民属于学历较高的人群,其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网络占有的比例是72.2%,此外,从收入和单位性质来看,目前网民从地域上集中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有着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单位的占有多数^④。可见,中国目前互联网使用状况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富裕化的特点。

网络参与的主体特征将会影响网络民主的参与方式和内容,也会导致网络民主具备一些中国特色。一方面,年轻化特点使得网络民主富有激情、有冲劲、创造力,但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知识化的特征导致网络民主参与目标的理想性^{⑤[31](363-366)}。此外,网络主体的结构特点除了影响网络民主的方式内容外,也使得网络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受到较大的限制。民主的真谛在于其平等性和广泛性,目前参与主体的范围限制直接影响了网络民主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可能产生新一轮的信息分化。目前网民主要是年轻人,这易于诱发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代际冲突;从身份上分,更多的网民是城里人,而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不知网络为何物的大有人在,这使得弱势群体被拒绝在信息社会的门槛之外。如果网民的现有的结构得不到优化,网络最终不过是新一轮的年轻知识精英的舞台,我们将很难听到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声音。此外,网络的非对称性发展在一国之内可能导致技术精英与信息资源贫困者的阶层分化,导致数字鸿沟问题的出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持的一项研究将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列为“数字鸿沟ABCD”四个方面:A(access)是指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渠道;B(basic skills)是指数字化时代需要掌握的信息技能;C(content)指网络内容;D(desire)指个人上网的动机兴趣等^[32];可以看出,数字鸿沟不仅和技术有关,也和个人的技能和偏好相关,可以预计,解决数字鸿沟仍然是信息时代比较棘

手的一个难题,而网络带来的新一轮的数字鸿沟,有可能会最终威胁到民主。

四、结语

网络民主激活了中国民主的活力,改变了传统政治的逻辑,但是,网络民主还受限于现实政治的发展,它目前的作用只能是在外围民主而难以进入到核心民主层面。网络对中国民主的影响与其说是提供了新的民主方式,重新塑造了民主,不如说是激活了民主的元素;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参与方式,不如说消除了传统政治的一些参与障碍。它把一些本应该属于民主政治的元素还原,它把一些被现实的束缚的东西解开,把失衡的权力配置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所以,网络在中国将承载更多的政治价值,甚至超过作为一种传媒媒介本应该承担的。中国未来的民主模式,可以以网络民主推进代议民主,用信息民主推进工业民主,走一条跨越式的新型民主道路。

尽管对网络民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无法做一准确定位和预测,但是对网络民主的作用范围和功能发挥进行界定,分析其可能带来的一些民主的福音和噪音,可以让我们明白网络民主在中国特定的运行逻辑。虽然这些结论主要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对于民主理想的提高收效甚微,但我们可以从网络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反差中寻找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间的相互作用去探求现实民主的实现途径。总之,对于网络民主,任何简单而省力的论证方式,将会妨碍我们洞察新生事物的眼睛,也会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

注释:

- ① 本文所采用的“传统时代”是相对与“网络时代”而言的,同样,传统政治也是相对网络政治而言。
- ② 图1、2、3调查数据根据2007年北京锐智阳光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两会”民意调查数据整理而成。详情参见:www.rises.com.cn。
- ③ 张雷在《虚拟技术的政治价值论》一书中提出了“现实政治与虚拟政治的分裂”的说法。他认为,现实和虚拟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虚拟社会代表理想的自我,现实社会代表真实的自我。如果现实生活中自由空间愈大,人们对虚拟社会政治空间的依赖性就愈小;同样,如果现实生活中自由空间受阻,那么在网络中自我表达,实现政治理想的人愈多。也既是说,理想的自我与实际的自我差距如果愈大,挫折感就愈强,现实政治和虚拟政治的分裂就越大。具体参见参考文献[23]。
- ④ 以上所有统计数据来自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日发布《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详情见

www.CNNIC.com。

- ⑤ 有关年轻化和知识化参与主体政治参与的特点,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知识化年轻化的参与主体其要求更难得到满足,因为知识分子的政治目标带有一定理想性和抽象性,而只受过低等教育的人农民等其目标却很具体,也更容易被满足,所以,他认为知识分子政治参与将是政治稳定潜在的动荡因素,具体参见参考文献[31]。

参考文献:

- [1] Mark Poster. Cyber democracy: The Internet and the Public Sphere [C]// David Holmes. Virtual Politics: Identity & Community in Cyber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5.
- [2] Graeme Browning. Electronic Democracy: Using the Internet to influence American Politics [M]. Wilton, CT: Pemberton Press, 1996.
- [3] L. Crossman.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reshaping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USA), 1996.
- [4] Roza Tsagarousianou. Cyberdemocracy: Technology, Cities and Civic Networks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6]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9.
- [7] 蒲岛郁夫. 政治参与[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
- [8] 李永刚. 网络扩张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J]. 战略与管理, 1999, (5): 68-72.
- [9] 乔·萨托利. 民主新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 [10] Alternative Futures Associations. Cyber Democracy 2001: A Global Scan [DB/OL]. www.altfutures.com, 2008-05-10.
- [11] Naavi. Cyber Democracy—It's the right of Netizen [DB/OL]. www.naavi.org/cyber_democracy/index.htm, 2008-05-10.
- [12]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13] Cutlip Scott. 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s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71.
- [14] 唐杰. 网络冲击传统政治文化[J]. 福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 (1): 40-42.
- [15] 叶琼丰. 时空隧道——网络时代话传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16] 新华网. 温家宝: 新华网等网站网民提意见问题多达几十万 [DB/OL].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4/content_4301366.htm, 2008-03-14.
- [17] 李永刚. 互联网与民主的前景[J]. 江海学刊, 1999, (4): 43-49.
- [18] 郭镇之. 关于当前舆论监督的结论和建议[C]//展江. 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新世纪舆论监督的语境和实践.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2.
- [19] 彭伟步. 从咖啡屋到网络公共空间[C]//陈卫星. 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

- [20]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2008-05-10.
- [21] D·德克霍夫. 文化肌肤: 真实社会的电子克隆[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8. [28] 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
- [22] 黄少华. 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C]//鲍宗豪. 数字化与人文精神.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29] Tim Jordan.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23] 张雷. 虚拟技术的政治价值论[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4. [30] 埃瑟·戴森. 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 [24] M·卡斯特尔.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1]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9.
- [25] N·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32] 丁未, 张国良. 网络传播中“知沟”现象研究[J]. 现代传播, 2001, (6): 11-16.
- [26] 王志弘. 技术中介的人和自我: 网际空间、分身组态与记忆装置[J]. 资讯社会研究, 2002, (3): 23-27.
- [27] 笑蜀. 政治开放不能止步于网络[DB/OL]. <http://www.tecn.cn>,

The function of and limits to cyber democracy in China

GUO Xiaolan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he Internet provides a new way of democracy, which can also activate the democratic elements, release the depressed enthusiasm for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reshape a new democratic form. Internet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olitical input and feedback, political oversighting and correction, and given a vent to and buffer political conflicts.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cyber democracy is up to realistic politics. Then, the phenomenon of “group polarization” an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would lead to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narrowing information and intensify emotional impact. Furthermore, the hidden and discrete character of Internet would bring about irra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t last, the main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netizens would also affect adversely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democracy. The result depends on whether government and netizens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 network media, and form a benign interaction.

Key Words: cyber democracy; Realistic function; Factors; Limits

[编辑: 颜关明]